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变与成因分析

索传军 戎军涛

摘 要 自图书馆学概念提出以来,已有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主题,可将其研究对象划分为机构范式、社会学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和人文范式五个阶段。不同研究范式反映了各个历史阶段研究热点或主题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每个阶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与发展。总体上,图书馆学研究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向:一是从技术、经验主义发展到理性主义;二是从静态的客体观演变为动态的过程观;三是从系统的结构主义转向更为本质的认知主义。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化,近似地遵循人类认知演化模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演变的成因,既有学科发展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又有学科内在因素,还有本学科认知主体因素。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历程看,图书馆及其事业的发展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影响较大,也是其演变发展的主要动因。图3。参考文献 59。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研究对象 研究主题 演变规律 演变成因

分类号 G250.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ause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SUO Chuanjun & RONG Juntao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lacks a clear core domain.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is a necessary and basic research task to determine the theoretical core proposition, solve the current discipline dilemma and 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theory system.

Since the concept "library science" was put forward, library science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main research them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ts objec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institutional paradigm, sociological paradigm, information paradigm, knowledge paradigm and humanistic paradigm. The institutional paradigm takes the libra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limits its vision to the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levels such as local technology, work and process of the library, and opposes the research outside the library field. The sociological paradigm examines the library in the social system, 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describes, reveals and explains the function and activity law of the library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takes information as the core concept to reconstruct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t focuses on the movemen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humanities and policy. The core concept of knowledge paradigm is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activities. It

通信作者:戎军涛,Email:rjt-205@163.com,ORCID:0000-0002-6242-0989(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RONG Juntao,Email:rjt-205@163.com,ORCID:0000-0002-6242-0989)

studies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knowledg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law of knowledge, and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knowledge content disclosure, evaluation, organization and utilization. Humanistic paradigm advocates taking human as the core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and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and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e existence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users.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reflect the changes of research hotspots or themes in various historical stages, from which we can se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bjects in each stage. On the whol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turns: from technicism and empiricism to rationalism, from static object view to dynamic process view, from systematic structuralism to more essential cognitivism.

Theoretically, our cognitive proces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bjects follows an approximate cognitive evolution model. The model is divided into ontology layer, intermediary layer and cognitive layer 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and 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gnitive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disciplinary internal factors and cognitive subject factors. From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use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and it is also the main reason for it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3 figs. 5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topics. Evolution law. Evolution causes.

0 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会全面向数字化和智慧化转型,图书馆也积极应对社会发展变化,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图书馆学一方面要总结过去,探索理论创新,为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要应对学科融合的挑战,寻找发展的生长点。为了改变学科发展困境,图书馆学积极联系图书馆行业和社会发展热点,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如理论上引入科学实证主义方法、技术上借鉴或融合一些新兴信息技术,但学科轴心的不断迁移导致学科的内涵和发展路径依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稳定的核心理论体系。分析我国图书馆学近40年来研究文献的主题演化路径可知,图书馆学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或者说跨学科融合研究越来越普遍;学科的中心和轴心越来越不清晰,或者说没有形成明确清晰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研究内容与

社会趋势、社会热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主流文献仍然停留或局限于图书馆及其相关工作的描述或经验总结,很少出现深入、系统、思想性强的理论研究成果^[1]。总体而言,我国图书馆学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经验性学科的特征,一方面受外界社会因素影响较大,工作总结式、环境影响式和技术驱动式研究主导学科发展;另一方面学科研究缺乏相对稳定和清晰明确的理论研究论域,研究对象、研究论题、研究主题频繁更换,知识体系日益庞杂,专业内容日趋泛化。学科与专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日趋衰落,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浪潮推动下,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失去了内生动力,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缺少应有的解释、预测和指导能力。

由科学发展史可知,学科理论层面的原创性突破是学科发展最根本的内生动力,它通过分析研究领域内相关客体及其运动规律,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结构、功能、动力以及产生和发展规律,能为学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理论来源、思想启迪和科学预见。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只能发生在核心论域,只有通过核心论域问题的探索和学科范型的转换,才有可能推进学科建设的科学化进程^[2]。因而,确定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论域并解析核心命题,是破解当前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困境、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任务之一。

研究对象是学科研究的客体,是一门学科成立的主要标志,它规定着学科的范围、内容和体系,构成了学科理论体系的轴心概念,是体现学科独立性的主要依据。因此,对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梳理和分析,是破解其理论研究核心论域问题的关键。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宏观上以促进社会信息和知识获取公平、消弭信息鸿沟、保存与传承人类文明为己任,微观上以“网络、空间和文献”为载体,试图解决人们对文献、信息、知识的发现、获取与利用等问题。历史上,图书馆曾是人们获取和利用文献的主要场所或途径,而且由于信息处理技术的限制,图书馆业务与文献、信息和知识的管理与服务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图书馆是图书馆学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服务领域。历史上,人们常常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局限于“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1985年张晓林在《图书馆学通讯》第3期发表《应该转变图书馆的研究方向》一文,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方向的狭隘化表面化的问题。2005年蒋永福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发文《再问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与研究方向问题——写在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发表20周年之际》,并指出“20年前,张晓林发文提出要改变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问题,至今问题犹在”。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界也相继涌现出了信息资源、信息交流和知识管理等创新性观点,但至今仍未完全改变“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因此,分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

总结研究对象演变的特征,阐明研究对象变化的成因,有利于确立图书馆学核心论域与学科价值,促进学科理论创新。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变

图书馆学源于图书馆,诞生于1807年,虽经历了200余年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十分明确的理论体系,甚至学术共同体对研究对象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其主要研究论域随社会热点的变化或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频繁变化,这一现象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尤为明显。分析不同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主题和核心论域,可将研究对象的认识划分为机构范式、社会学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和人文范式。

1.1 机构范式

图书馆学研究的机构范式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将视野局限在图书馆局部的技术、工作、流程等具体表象层面,反对研究图书馆领域之外的事物^[3],代表思想有施雷廷格的“文献整理说”^[4],艾伯特·莫尔贝希的“图书馆学体系”^[5],帕尼兹、爱德华兹的“图书馆管理思想”^[6,7],杜威的标准化、规范化、职业化的图书馆实用主义思想等^[8,9]。

受欧美、日本的机构范式影响,我国20世纪初期的图书馆学思想多将研究客体指向单个、具体的图书馆活动,认为图书馆学是关于图书馆的理论与技术的总和,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图书馆一切事项的学问,主要研究图书馆内部组织法、管理法、使用法。例如,杜定友曾形象地把图书馆比作“人的公共脑子”,他和刘国钧还分别以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等“要素说”来具体剖析图书馆的内部结构。随着对图书馆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入,机构范式进一步演变、拓展为社会学范式。

1.2 社会学范式

芝加哥学派是推动图书馆学科学化的主要

学术力量,也被称为图书馆社会学派,代表人物有巴特勒等。他们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图书馆机构,对图书馆的机构要素、本质进行抽象;引入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将图书馆置于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并进一步从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描述、揭示、说明图书馆的功能和活动规律,拓展了学科的研究范围,推动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进程,产生了至今仍然非常有影响力的图书馆学理论。巴特勒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现象,尤其只需关注图书馆事业基本现象中的理性内容,即借助图书将社会积累的经验传递给社会每一个成员^[10];提出文献中所包含的“社会的知识”通过“阅读”转移到“个人的知识”,图书馆就是保存、传递“社会知识”或“社会记忆”的机构^[11]。此外,德国图书馆社会学派同样值得关注,代表人物为卡尔施泰特,他提出了“图书馆社会学”思想,分为图书馆历史社会学、体系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三部分。他的思想主要有:图书馆发生发展的社会学原因是其永久的公共性,其社会功能是维持和传播社会精神;图书是客观精神的容器,图书馆是个人精神与客观精神接触、联系的场所,通过图书的普及将客观精神移植于个人,同时也推动人创造的能动性^[12]。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图书馆事业说”,具体包括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等诸多观点,不但拓展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宏观领域,而且深入研究了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各种复杂联系。

1.3 信息范式

20世纪60年代,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促使情报学迅速发展,图书馆学界开始积极融合情报学思想,努力突破机构范式视野,促使研究轴心向“信息”转移,最终图书馆学、情报学融合形成了图书馆信息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13],代表人物有谢拉、萨拉赛维卡、米哈依诺夫等。

基于大众传播视角的信息交流理论是信息

科学领域的主流思想。谢拉提出了图书馆的社会交流学说和社会认识论^[14];萨拉赛维卡认为,信息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交流现象和交流系统的科学^[15];米哈依诺夫从科学交流的角度构建了信息科学的概念体系,认为信息学是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门学科,其研究领域是科学交流系统,主要研究科学信息的构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16]。在信息范式内,图书馆信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未能超越萨拉赛维卡、米哈依诺夫所划定的范畴^[17]。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开始提出自己的“信息交流”观点,代表学说有情报交流说、文献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等。“信息”概念的内涵十分宽泛,这导致构建在“信息”基础上的图书馆信息学的理论体系边界模糊,未能阐明理论内核,始终未能清楚界定它与情报学、计算机信息科学、通信论信息科学的边界。

1.4 知识范式

20世纪80年代,布鲁克斯引入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思想,提出以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作为图书馆信息学的理论基础^[18]。布鲁克斯的客观知识思想得到了图书馆信息学界的普遍认可和支持。彭修义^[19]在1981年提出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建议后,刘迅^[20]、马费成^[21]先后将布鲁克斯的思想引入国内,我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也转向客观知识层面,研究内容从文献管理、信息管理、信息交流等“非本质研究”逐渐过渡到知识交流、知识组织、知识集合、知识资源、知识管理等“近似本质研究”^[22]。知识交流学说的研究内容包括社会知识交流的基本原理、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社会实体间的相互关系、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和工作机理^[23];针对知识交流的不足,知识组织学说则认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是知识组织^[24-26];知识集合说以集合论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的范畴体系,认为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27];知识资源论认为图书馆学是关于知识资源的收集、组

织、管理与利用,研究与文献和图书馆相关的知识资源活动的规律,以及研究知识资源系统的要素与环境的一门科学^[28]。

知识范式是数据智能时代图书馆信息学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超越图书馆实体层面,在知识层面开展理论研究,是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从国内外 LIS 学科发展实践看,知识的揭示、评价、组织、利用等是图书馆信息学的理论核心^[29]。

1.5 人文范式

图书馆学的人文范式研究又称人文图书馆学,是指侧重从人文视角观察图书馆现象的一种图书馆学理论形态或流派。人文图书馆学主张以人为图书馆学的核心对象,特别重视和强调用户的主体性存在及其价值实现^[30],关注的领域包括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职业理念、图书馆自由、知识权利、信息公平等。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精神折射到图书馆领域引发了人文精神的解放。现代图书馆是 19 世纪公共图书馆运动的产物。1850 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图书馆法》,确立了“对外开放”理念。继美国图书馆协会 1945 年颁布《图书馆权利宣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49 年颁布《公共图书馆宣言》,IFLA 于 2002 年颁布《图书馆格拉斯哥宣言:信息服务和知识自由》^[31]。

俄罗斯图书馆学在 20 世纪末涌现出了文化学派,认为图书馆学应从文化角度考察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图书馆应建设成为人类知识和文化的神圣而宏伟的殿堂^[32]。新千年以来,我国以李国新、范并思和蒋永福等为代表的关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推动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创新,提出公众自由利用图书馆是一种权利^[33],系统地阐明了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34]。2008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图书馆服务宣言》,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人重建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工作初步完成^[35]。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每次改变,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图书馆学理

论的发展。特别是从机构范式迁移到信息范式之后,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信息政策、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管理与服务等领域。当前,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知识范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科学者的认同,这是数据智能时代学界对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期盼。但不可否认,“知识范式”也仅仅是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诸多学说的一种而已,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文献”“信息”和“知识”,应该看到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一个历史变迁过程,如图 1 所示。

2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知演变特征

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知属于科学性认知范畴,其认知思想发展、深化的过程必然受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过程可以概括为:从技术、经验主义发展到理性主义,从静态的客体观演变为动态的过程观,从系统的结构主义趋向更为本质的认知主义。

2.1 从技术、经验主义发展到理性主义

在经验图书馆学阶段,人们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位于藏书整理技术与业务、机构管理层。由于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强调实践性,其技术属性尤为明显,因此人们最先从技术视角认识这门学科。在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孕育时期,人们普遍采用经验观察来认识藏书活动,利用分类、文摘、目录、索引等藏书整理技术手段来管理藏书活动。西方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是图书学与目录学,我国古代藏书整理思想主要为校讎学,涵盖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内容^[36]。近两千年文献整理的实践经验和系统总结孕育了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在 19 世纪图书馆学形成的早期阶段,顺承于古代的藏书整理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图书馆学的首要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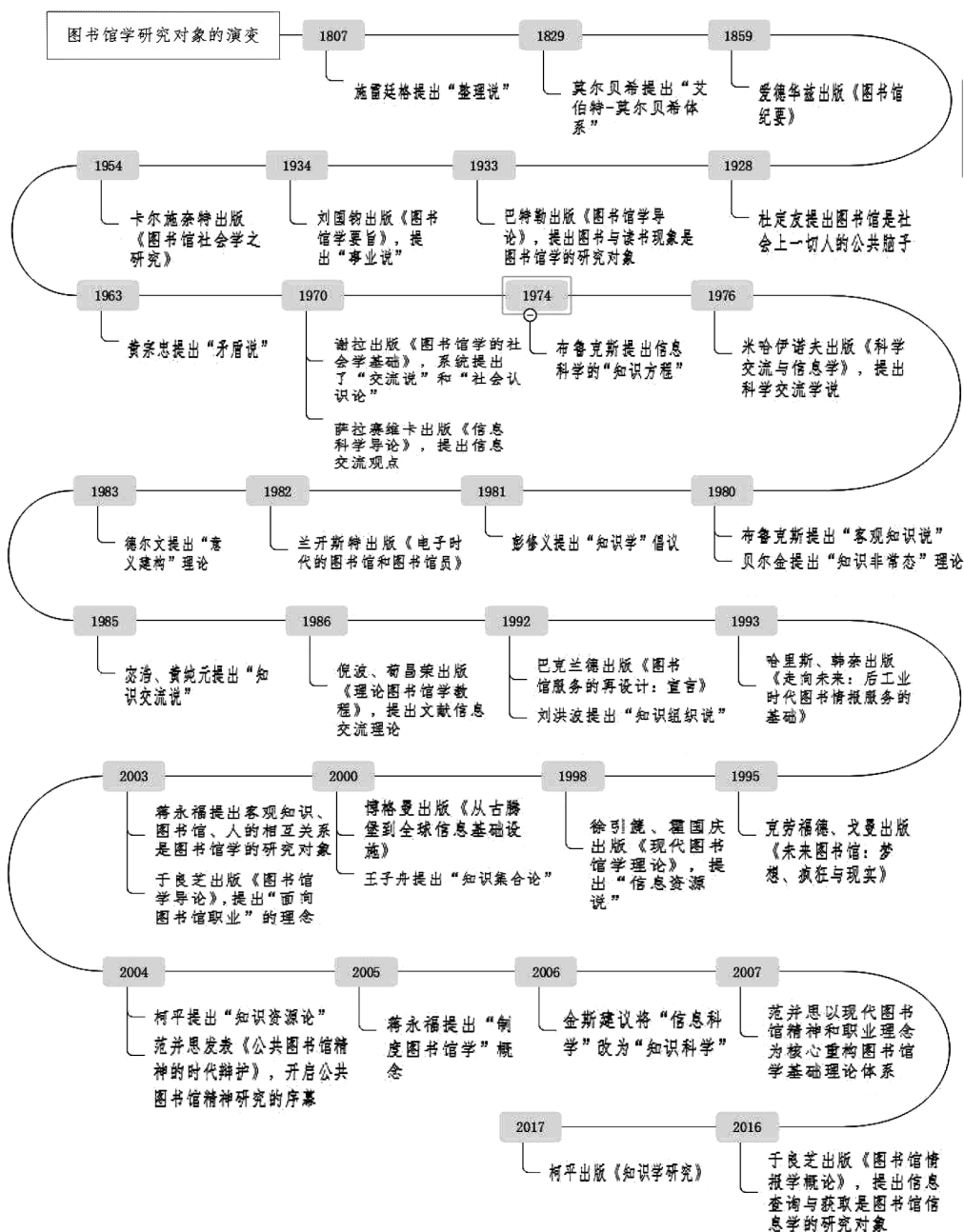


图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

经验管理主义是机构范式在图书馆领域的具体表象,它超越了局部经验技术主义,试图从整体管理的视角来描述、说明图书馆机构活动

的全部流程,接近人们的直接观察体验和感受,这在图书馆学发展早期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在整个19世纪占据了图书馆学的主流,具有十

分广泛的影响。然而经验主义范式并不能揭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动力与发展规律,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种研究范式越来越不适应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发展要求。

芝加哥学派彰显了图书馆学的科学理性主义精神,对图书馆现象的认识更加抽象、深刻。该学派认为,图书馆现象是社会的产物,并非具体的机构,而是抽象的社会存在,是一种社会知识保存与传递的制度安排;知识传递与交流是其核心研究内容,图书、人、主观世界、客观精神、社会记忆等是其研究的核心概念;图书是客观精神或知识的载体,通过图书的传递与人类的阅读,能够完成知识、社会记忆、客观精神的移植。

步入信息、知识时代后,我国图书馆学界逐步产生了文献交流、文献信息交流、知识交流等交流说思想,结合“客观知识”思想提出了“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论”“知识资源说”等知识学说。国际上围绕图书馆信息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研究,相继涌现出诠释学、历史主义、实用实在论、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哲学思潮^[37]。于是,“社会认识论”重新引发关注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北欧学者约兰德提出了领域分析方法论^[38],周文杰提出了社会认识层次论^[39]等认知观。理论格局的多元化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进程。

2.2 从静态的客观点演变为动态的过程观

机构范式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演变,信息范式超越了机构范式的实体局限,又将广泛的信息交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但无论机构范式还是信息范式,本质上都是一种静态的客体范式。它们普遍将图书馆或者知识、信息资源系统作为中心,忽视了人与知识或系统间的交互过程,是一种系统导向的静态客观点。它们主要关注文献、信息与知识的获取问题,忽视了人的因素,自然也就忽视了图书馆、文献、信息与知识对人与社会的价值。

知识范式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和知识活动,

研究知识的本质与功能,知识的形成与演化规律,知识的生产、加工、组织、传播、利用等一系列活动的理论与方法,能为人类社会的知识记忆与创新提供保障^[40]。在知识范式下,知识、信息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客体,而是一种不同主体间的交互过程。一方面,信息与知识的转化过程是知识范式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巴克兰德将信息的概念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意义范畴^[41]:作为过程的信息(information as process),信息是知识或消息的传播;作为知识的信息(information as knowledge);作为事物的信息(information as thing),包括数据、文本、文献、物体乃至事件。布鲁克斯提出了著名的知识方程理论^[42],用数学公式描述了信息与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温有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信息与知识之间的转换问题^[43]。另一方面,知识与人的关系也被纳入知识的广义范畴。王琳指出,对知识的认识不应只局限于对知识及知识活动的静态描述上,还应表现为以知识、人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为核心的一种动态过程性命题^[44]。张晓林强调,对“知识”应当做广义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种对象,同时也是一种过程,更是一种体验^[45]。

在知识范式下,图书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认知逐步转向动态的过程观。例如,布鲁克斯认为图书馆信息学应该研究客观知识与主观精神世界的相互作用;蒋永福构建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客体—中介—主体”范式,提出客观知识、图书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指出图书馆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揭示和解释客观知识、图书馆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机理^[46]。

2.3 从系统结构主义趋向更为本质的认知主义

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历来重视阅读传统,如维普尔斯对阅读现象的研究,对阅读行为、心理的研究包含着认知主义的萌芽^[47];巴特勒将图书馆作为社会系统和制度的构件进行考察,分析了图书馆功能的社会本质,认为图书馆

是社会公共知识的记忆和传递制度,具体知识传递机制的核心概念是图书和阅读现象,并进一步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角度解释了图书、读书和知识传递现象^[48];谢拉进一步提出将“社会认识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重点考察知识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并将图书馆学看作是一门有关知识与社会行为的综合性新学问。但“社会认识论”仅仅是一个理论框架,谢拉并未完成其理论构建。

知识范式对知识的研究体现出一种系统结构主义倾向,从语法和语义层面对组成知识的内容单元进行不断的解构。知识研究的粒度正在逐步从文献层面深入到文献信息以及文献所承载的知识内容层面,知识也被进一步解构为知识单元、知识元、知识基因、知识因子等颗粒度更小的知识结构,体现了人类对知识认识的深化,是人类对知识认识的必然趋势。索传军等在《知识元的内涵、结构与描述模型研究》一文中指出,一篇文献是一组知识元的逻辑组合^[49],对知识结构的深入研究必然转向认识主义路径。

无论是机构范式还是知识范式,都体现出认识主义的倾向。认识范式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动态交流范式,强调主观性、建构性、认知性,重视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注重知识的利用效果,关注主体吸收知识后认知结构的改变,其目的是满足主体的知识需求,推动知识创新。贝尔

金的知识非常态理论^[50]、德尔文的意义构建理论^[51]等都是图书馆信息学领域的经典认知范式模型,其理论假设是人类的主观世界会因外界信息的输入而改变。

3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成因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社会实践发展不断深化、拓展、接近本质的过程。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是这样,是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演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发展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又有学科内在因素,还有本学科认知主体因素。总体上,图书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近似地遵循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演化模型。

3.1 认知演化模型

认知演化模型客观地描述了人类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发展过程,认知是特定历史环境下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过程。人类认知演化过程可以用图2所示的模型进行描述,该模型在纵向维度上分为本体层、中介层和认知层,在横向维度上分为n个历史发展阶段。

研究对象作为客体,处于本体层。客体是一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人类认知的物质基础,具有本质属性、存在状态和运动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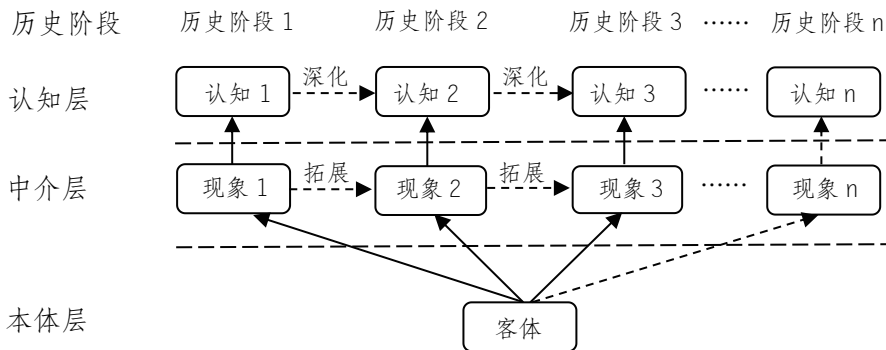


图2 人类认知演化过程模型

现象是客体运动的外在表现,位于中介层,是联系认知和客体的媒介。人类认知通过现象来观察、体验客体。认知是人类的意识、精神、情绪、思维活动,位于认知层。认知通过感觉、知觉、表象思维将反映的零散、局部、片面的现象属性整合、概括、综合,并进一步抽象为理性认识^[52]。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这种理性认知的综合就表现为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人类社会实践的范围和层次都不相同。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53]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与我国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以及图书馆信息化程度都有密切的关联。通过科学发展史我们也会发现,前一历史阶段的理论往往是下一阶段新的理论的特殊实例,这恰恰说明了理论发展的科学革命范式。

3.2 具体成因分析

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心理学领域兴起的具身认知理论为我们分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

变成因提供了理论基础。具身认知理论最初源自哲学领域,是欧美哲学家反思和批判主客观二元论的思辨产物。目前具身认知理论已经走向实证探讨,许多心理实验开始支持具身认知的理论假设,具有较强的学科解释能力^[54]。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和环境在认知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主要观点是:认知和思维受到身体物理属性的制约;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决定了认知的种类和性质;身体嵌入环境之中,认知、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并构成了一个一体化的系统,认知是大脑、身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55]。

依据具身认知理论,我们认为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知的因素可以分为环境因素、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如图3所示。环境因素是研究对象演变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是认知活动存在与发生的自然与社会文化背景系统,影响着认知活动的开展。客体因素指学科自身发展因素,是学科自身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内在学理发展逻辑。主体因素是指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的主观认知因素,即有关图书馆专家学者的认知方法是否科学,对客体的认知是否深入到图书馆活动本质层,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象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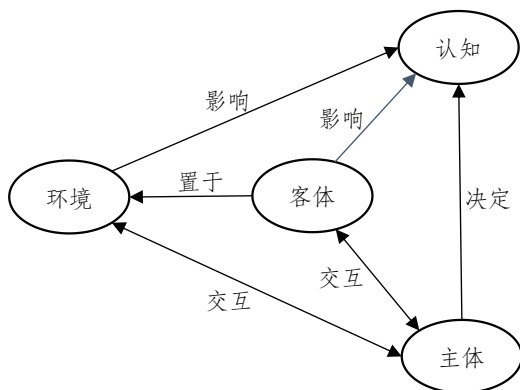


图3 认知演化模型影响因素

(1) 社会环境因素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环境在认知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强调,认知根植于环境、历史、文化之

中^[56]。社会环境具有社会、文化或组织特征,主要包括社会角色、组织环境、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化传承、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一系列社会资本力量。在历史时代的变迁中,图书馆事

业和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知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经历了恢复期、调整期、停滞期、重建期和发展期,目前进入转型期。图书馆事业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生存基础,影响着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知。我国的要素说、规律说、事业说、矛盾说都来自于对图书馆事业的直接观察、体验和思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图书馆业界要求图书馆学界开展“宏观现实问题”研究,摆脱“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进入21世纪以来,图书馆事业逐渐从重数量转型到重质量的发展路径上来,特别是2018年《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应用性更加明显,研究主题涉及战略规划、公共图书馆法、法人治理、公共文化服务、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精神等众多领域。显然,新时期图书馆事业的飞速发展更加固化了人们关于图书馆学的“应用性”学科的认知,强化了“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学问”这一认知。

信息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献组织、开发与利用的程度、层次与水平。在机构范式阶段,对文献内容的处理受信息技术的限制,人们对文献的开发利用局限在文献表层。这是由于,一方面人们对文献、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利用的场景主要是图书馆;另一方面图书馆主要利用传统手工技术对文献的外部 and 内部特征进行描述和表征,向用户提供基于文献的检索和利用服务。在这一时期,馆藏文献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轴心,图书馆业界与学界普遍将文献管理与服务等同于知识管理与服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聚焦在“图书馆”“文献—图书馆要素”等层面。20世纪中后期,随着计算机、数据库、通信和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人们处理文献信息的能力有了较大提升,可以对多种载体形式的信息进行组织、表达、检索和共享,但对馆藏文献中知识的深层次组织和揭示仍显得力不从心。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人工智能、语义

网等信息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知识的数据化与语义化表达成为可能。图书馆也开始注重数据分析、知识发现和智能决策支持服务。知识这一客体被更加显著地揭示出来,逐步形成了具有知识范式的新兴研究领域^[57]。

(2) 学科客体因素

学科客体是学术共同体认知活动的对象,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因素,同样影响着主体的认知。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在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推动学科发展。学科的理论内容为认知主体提供了事实、数据、观点、视角、技术、工具、方法等知识,帮助认知主体建构起对学科的认知概念体系,促进认知主体改变知识结构,从而实现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也容易局限于现有学科的理论认知,难以超越学科的认知边界,无法实现学科逻辑的超越和历史现实的创新。

图书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将研究视野定位在“图书馆业务”的层面,适应了当时图书馆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广大民众对于文献获取和阅读的需求。19世纪欧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为图书馆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在图书馆学发展的相当长时期内,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成为图书馆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图书馆机构成为研究对象,进而促成了机构主导范式。从1807年图书馆学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信息交流范式的兴起,机构范式占据了将近150年的时间,影响十分广泛。然而,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图书馆学知识体系中也存在大量非学术的、经验描述式的职业培训内容。例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被认为是经验图书馆学的集大成之作,但却遭到了当时一些年轻学者的强烈批判。即便是数据智能时代的今天,仍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学问、是机构之学、超出图书馆边界的研究不属于图书馆学理论范围。和其他学科相比,图书馆学的

机构范式研究缺乏具有科学性解释力和影响力的理论学说,学术输出有限,学界内外以及社会的认可度不高,导致其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备受质疑。这种机构范式的理论研究影响着新一代图书馆学人的认知,非常不利于学科的生存和创新发展。

从学科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学科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力源自于学术共同体在本学科研究范式框架内基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所提出的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科学问题的孕育、提出、解决从根本上来说遵循学科范式所规定的自身内在逻辑路径,外在形式上表现为学术积累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库恩提出常规科学的任务就是解谜,即解决学科设立的常规问题。在机构范式内,“图书馆管理说”建立在对“文献整理说”批判的基础上。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范式建立在对经验主义机构范式批判的基础上。信息范式超越了机构范式,知识范式则是对信息范式的进一步深化,而认知主义范式又萌芽于知识范式内,正在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知的发展演变遵循了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路径,这是由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

(3) 认知主体因素

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所要阐释的普遍的、本质的、抽象的客体,而不是反映客体的局部的、阶段性的、表层的社会现象。任何学科在形成之初,对于研究对象进行经验性的描述,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58]。在图书馆学学科建立之初,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图书馆业务层面,无论对于图书馆学还是对于图书馆事业都是积极有效的。从学科的实践应用层面来看,这种认知也符合当时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对应用性理论的需求,有助于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并非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分化出来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古代文献整理实践逐步孕育生成的,具有明显的应用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不需要科学理论。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早期,有

相当一部分从事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来自实践领域,与其他社会科学人员相比其科学理论素养有限,而且热衷于技术实用主义。例如,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序言中强调:不是追求什么理论上完整的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来设法解决一个实用的问题^[59]。即便是在当今,这种倾向也依然存在,如现在普遍存在的“技术促进论”热衷于新的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忽视图书馆学对科学理论的贡献与社会价值问题的思考。

图书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缺乏科学精神的洗礼,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范式,尽管后期经过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改造与提升,但依然无法改变“轻视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应用和业务描述”的倾向,部分学人将图书馆学看作是一门服务于图书馆的实用技术性学科,一方面只局限于图书馆谈学科发展,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技术对图书馆或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这种认知导致图书馆学的理论构建缓慢而艰难,iSchool运动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4 结语

当前,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缺乏较为明晰的核心论域,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是确定理论核心命题、破解当前学科困境、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任务。“如何有效管理、获取和利用文献、信息和知识”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图书馆学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通过分析图书馆学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主题与核心论域,本文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经历了机构范式、社会学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和人文范式的发展演变。机构范式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立足图书馆事业实践,反对研究图书馆领域之外的事物;社会学范式将图书馆置于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进一步从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描述、揭示、说明图书馆的功能及活动规律;信息范式以信息作为核心概念来进

行理论体系重构,围绕信息的运动、组织、管理等方面从技术、人文、政策等视角进行研究;知识范式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和知识活动,研究知识的本质与功能,知识的形成与演化规律,知识内容的揭示、评价、组织、利用等理论与方法;人文范式主张将人作为图书馆学的核心对象,重视和强调用户的主体性存在及其价值实现,关注图书馆精神、核心价值、职业理念、自由与权利、信息公平等领域。

从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历程看,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变化的、发展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或者说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学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过程,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图书馆学人认知演变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从技术、经验主

义发展到理性主义,从静态的客体观演变为动态的过程观,从系统的结构主义趋向更为本质的认知主义。另外,通过分析发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演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发展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又有学科内在因素,还有本学科认知主体因素。总体上,图书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近似地遵循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演化模型。

概括地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图书馆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核心研究论域。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对其研究对象的认识,近似地遵循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演化模型,但总体上还处于认知演化模型的客体层和现象层,对图书馆学本质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 [1]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8—2019图书馆学学科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5.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2018-2019 report on advances i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M]. Beijing: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20:5.)
- [2] 梁灿兴,白君礼,褚流杰,等. 图书馆学“核心论域”的探索与发展——“图书馆学核心论域的探索与发展”网络研讨会笔谈[J]. 图书馆论坛,2013,33(3):31-35. (Liang C X, Bai J L, Chu L J, et al. O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re domain of library science: webinar minutes of “on trends of the objective knowledge ontology of the basic theory of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 2013, 33(3): 31-35.)
- [3] 梁战平. 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3(3):193-198. (Liang Z P. Detailed discussion of some issues concerning information science[J]. Inform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3): 193-198.)
- [4] 徐跃权,徐兆英,刘春丽. 马丁·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思想与贡献[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4):37-50. (Xu Y Q, Xu Z Y, Liu C L. Martin Schrettinger's thoughts on and contributions to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6, 42(4): 37-50.)
- [5]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73-74. (Wang Z Z. Basic course of library science[M]. 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03:73-74.)
- [6]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55-166. (Yang W L. A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M].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8:155-166.)
- [7] 王子舟.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知过程及范式特征[J]. 江西图书馆学刊,2002(3):1-8. (Wang Z Z. The cognitive process and paradig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The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Jiangxi, 2002(3): 1-8.)
- [8] 范并思. 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的理论史纲[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8-11. (Fan B S. The 20th century library science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a Delphi-based historical study[M]. Beijing:Beijing Library Press,2004:8-11.)
- [9]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92,96.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M]. Beijing: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14:92,96.)

- [10] 皮尔斯·巴特勒. 图书馆学导论[M]. 谢欢,译.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38. (Butler P.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Xie H,trans. Beijing:China Ocean Press,2018:38.)
- [11] 黄纯元. 论芝加哥学派(下)[J]. 图书馆,1998(2):6-9. (Huang C Y. On Chicago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part 3)[J]. Library,1998(2):6-9.)
- [12] 李广建. 卡尔施泰特和他的图书馆学思想[J]. 湖北高校图书馆,1987(1):66-69. (Li G J. Karstedt and his thought of library science[J]. Hubei University Library,1987(1):66-69.)
- [13]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66-71. (Yu L Z.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 Beijing:National Library Press,2016:66-71.)
- [14] 杰西·H·谢拉. 图书馆学引论[M]. 张沙丽,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59-72. (Shera J H.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Zhang S L,trans. Lanzhou:Lanzhou University Press,1986:59-72.)
- [15] Saracevic T.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cience[M]. New York:R. R. Bowker,1970.
- [16] 米哈依诺夫. 科学交流与情报学[M]. 徐新民,译.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423-446. (Mikhainov.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cs[M]. Xu X M,trans. Beijing: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ion Press,1980:423-446.)
- [17] 闫学彬. 信息科学:概念、体系与展望[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04-112. (Yan X B. Information science:concept,system and perspective[M]. Beijing:Science Press,2016:104-112.)
- [18] Brookes B C. The 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 science:part I. philosophical aspect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0,2(3-4):125-133.
- [19] 彭修义. 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J]. 图书馆学通讯,1981(3):85-88. (Peng X Y. Suggestions on the research of “knowledge science”[J]. Library Science Newsletter,1981(3):85-88.)
- [20] 刘迅. 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J]. 情报科学,1982(1):15-22. (Liu X. On the common basi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reflections on Popper's world 3 theory [J]. Information Science,1982(1):15-22.)
- [21] 马费成. 论布鲁克斯情报学基本理论[J]. 情报学报,1983(4):314-324. (Ma F C. On B. C. Brookes' fundamental the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1983(4):314-324.)
- [22] 马恒通,黄闽. 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争鸣六十年[J]. 图书馆学刊,2011(3):1-5. (Ma H T,Huang M. On the contention of study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past 60 years[J]. Library Journal,2011(3): 1-5.)
- [23] 宓浩,刘迅,黄纯元. 图书馆学原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07-212. (Mi H,Liu X,Huang C Y. Principals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88:207-212.)
- [24] 刘洪波. 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J]. 图书馆,1991(2):13-18,48. (Liu H B. Knowledge organization theory:an explanation of library internal activities[J]. Library,1991(2):13-18,48.)
- [25] 王知津. 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发展策略[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4):3-8. (Wang Z J. Research topic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1998(4): 3-8.)
- [26] 蒋永福. 图书馆与知识组织——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理解图书馆学[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5):19-23. (Jiang Y F. Library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understanding library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1999(5):19-23.)
- [27] 王子舟. 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4):7-12. (Wang Z Z. On knowledge sets:exploring on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00(4):7-12.)
- [28] 柯平. 知识资源论——关于知识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J]. 图书馆论坛,2004,24(6):58-63, 113. (Ke P. Knowledge resources theory:on knowledge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e study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2004,24(6):58-63,113.)

- [29] 叶继元. 图书情报学(LIS)核心内容及其人才培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 36(6): 13-19. (Ye J Y. On core cont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0, 36(6): 13-19.)
- [30] 蒋永福. 人文图书馆学论纲[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4): 9-13, 58. (Jiang Y F. A treatise on humanistic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2(4): 9-13, 58.)
- [31] 范并思. 构建中国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之思考[J]. 图书与情报, 2015(3): 50-55. (Fan B S. Thinking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library[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15(3): 50-55.)
- [32] 林曦. 俄罗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热点评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7(6): 26-31. (Lin X. An analysis of major topics in theoretical studies of library science in Russi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7(6): 26-31.)
- [33] 李国新. 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J]. 图书馆, 2002(1): 16-21. (Li G X. A few opinions on the theory of the freedom of library[J]. Library, 2002(1): 16-21.)
- [34] 范并思.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2): 5-11. (Fan B S. A modern defense of the spirit of public libra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4(2): 5-11.)
- [35] 范并思. 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艰难重建——写在《图书馆服务宣言》发布之际[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6): 6-11. (Fan B S. Rebuilding modern library idea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6): 6-11.)
- [36] 龚蛟腾. 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 从校雠学说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变[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27. (Gong J T.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he evolution from collation theory to modern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3: 27.)
- [37] 王知津, 周鹏, 韩正彪. 当代情报学哲学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 2014, 33(2): 116-129. (Wang Z J, Zhou P, Han Z B. Main viewpoints 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 system for the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4, 33(2): 116-129.)
- [38] Hjørland B, Albrechtsen H. Toward a new horiz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 domain-analysis[J]. JASIS, 1995, 46(6): 400-425.
- [39] 周文杰. 社会认识层次性与图书馆的本质论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1): 18-33. (Zhou W J. The hierarchies of social epistemology and the essences of library system[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 45(1): 18-33.)
- [40] 柯平. 知识学研究导论[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4): 6-10, 34. (Ke P. On research of knowledge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6(4): 6-10, 34.)
- [41] Buckland M K. Information as th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5): 351-360.
- [42] Brookes B C. Robert fairthorne and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74, 30(2): 139-152.
- [43] 温有奎, 徐国华. 信息与知识变换[J]. 情报学报, 2002, 10(5): 613-617. (Wen Y K, Xu G H.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to knowledg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02, 10(5): 613-617.)
- [44] 王琳. 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30年(1987—2017)的回顾与思考[J]. 情报学报, 2018, 37(5): 543-560. (Wang L. 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30 years of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1987-2017)[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8, 37(5): 543-560.)
- [45] 张晓林. 从数字图书馆到 E-Knowledge 机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4): 5-10. (Zhang X L. From digital library to E-Knowledge mechanism[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5(4): 5-10.)
- [46] 蒋永福. 客观知识·图书馆·人——兼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5): 11-15.

- (Jiang Y F. Objective knowledge, library and man, with a study of the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3(5):11-15.)
- [47] 黄纯元. 论芝加哥学派(中)[J]. 图书馆, 1998(1):7-10. (Huang C Y. On Chicago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part 2)[J]. Library, 1998(1):7-10.)
- [48] 袁咏秋, 李家乔.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345-351. (Yuan Y Q, Li J Q. Selected classics of foreign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8:345-351.)
- [49] 索传军, 盖双双. 知识元的内涵、结构与描述模型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44(4):54-72. (Suo C J, Gai S S. Study on 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description model of knowledge element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8, 44(4):54-72.)
- [50] Belkin N J. Anomalous states of knowledge as a basis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J].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80(5):133-143.
- [51] Dervin B. An overview of sense-making research: concepts, methods and results[EB/OL]. [2021-06-26].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wpratt/MEBI598/Methods/An%20Overview%20of%20Sense-Making%20Research%201983a.htm>.
- [52] 史忠植. 认知科学[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62-71. (Shi Z Z. Cognitive science[M]. Hefei: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8:62-71.)
- [5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337-338. (Compilation Bureau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4[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337-338.)
- [54] 叶浩生. 具身认知: 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5):705-710. (Ye H S. Embodied cognition: a new approach in cognitive psychology[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18(5):705-710.)
- [55] 叶浩生. 西方心理学中的具身认知研究思潮[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50(4):153-159. (Ye H S. The thought of embodied cognition in western psychology[J].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 50(4):153-159.)
- [56] 王光荣. 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两种范式——皮亚杰与维果茨基认知发展理论比较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3(5):164-169. (Wang G R. Two research paradigms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comparison between Piaget and Vygotsky on theorie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53(5):164-169.)
- [57] 马费成. IRM-KM 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290-291. (Ma F C. Research on IRM-KM paradig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8:290-291.)
- [58] 刘迅. 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兼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道路[J]. 图书馆学刊, 1983(4):1-12. (Liu X. Western library science school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al way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1983(4):1-12.)
- [59] 范兴坤. “实用”和“读者至上”的美国图书馆实践[J]. 图书馆建设, 2008(10):106-110. (Fan X K. Practical utility and readers the first in American library's practice[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8(10):106-110.)

索传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戎军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 2021-12-06)